

近年来，
关于中国古代
对外经济关系
史的探讨已初
步展开。我国
古代对外经济
关系史一直是
历史学中的一个
薄弱环节，
至今依然有许
多问题有待研

上古时代中国同希腊贸易的通道

——“草原之路”之探讨

沈 根 荣

究和探讨。本文试就上古时代中国同希腊贸易的通道——“草原之路”作一初步的探讨，以期引起专家、学者对此的关注和研究。

一、我国丝绸远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就已行销希腊

在张骞通西域很久之前我国丝绸即已行销希腊。有不少古希腊的学者对此都作过记载。著名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中提到过丝。公元前四世纪，据希腊史学家奥尼斯克利道斯的《沿岸航行记》记载：“西方诸国所用之丝与铁，皆从中国输来。”^①根据古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著作，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时西方已经把中国称为“赛里斯”国。^②“赛里斯”是蚕丝产地或贩卖丝绸人的意思。可见，至少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丝绸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的一种进口商品。

中国丝绸到达西方的实际时间应早于公元前四世纪。大约成书于公元前九世纪的古希腊著名诗篇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纪》^③第十九卷中有一段引人注目的对话反映了这一事实。诗中的主人公奥德修装扮成外地人对妻子谈起奥德修在国外所穿的一件衬衫，他说：“我还注意到，他身穿的衬衫非常光滑，轻细有如干了的葱皮那样，而且象太阳一样发出光辉，使得许多妇女看了都非常惊奇。”很明显，奥德修所描写的这件衬衫的特征“非常光滑，轻细有如干了的葱皮那样，而且象太阳一样放出光辉”，正是丝织品的典型特征。其他材料都不具备这些特点，即使再精细的麻纱也不可能。我们知道，西方掌握养蚕缫丝技术是比较晚的。在荷马史诗年代，西亚地区还不可能产丝，当时丝织品的唯一来源只能是中国。从上述这段话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当时丝织品还是很珍贵、很罕见的，因而才值得奥德修把自己的这件衬衫炫耀一番。这是符合当时中西方交通艰难，中国丝织品不可能大量输入西方的事实的。由于荷马诗史是在大约公元前九世纪形成的，根据诗中出現丝织品的记载，我认为早在公元前九世纪前后，中国丝绸已经行销希腊。

张骞通西域始于公元前138年。“丝绸之路”形成于张骞通西域之后。因此，我国丝绸是在“丝绸之路”形成以后才输往西方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草原之路”的走向

既然在张骞通西域几个世纪以前，中国的丝绸已经到达希腊，那末，中国的丝绸是通过

什么途径到达希腊的呢？

有些中外历史学家认为，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东方商品可能通过北方草原进入西方。我很赞成这个想法。我认为，这条“草原之路”的大致走向是从我国的天山北麓，经过阿尔泰山，穿过中亚细亚草原，越过乌拉尔山，沿黑海北岸，进入希腊。东方的商品通过“草原之路”，经过草原游牧民族居间转运，以间接贸易方式进入西方。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对“草原之路”的西端作过详尽介绍。古希腊以黑海沿岸的塞奇提亚人居间同东方进行贸易。书中说，塞奇提亚人借着七名通译通过七种语言经塞奇提亚人居住的地区直到“高山脚下秃头者所居住的地方”。当时希腊人对东方情况的了解仅到“秃头者居住的地方”为止。希腊人对“秃头者”以东情况很不清楚，只是通过塞奇提亚人才知道。在“秃头者”以东居住着伊赛多涅斯人。在伊赛多涅斯人以北，则居住着“独眼族”和“看守黄金的鹰头狮身兽”。东方的黄金经由塞奇提亚人运到希腊来。显然，我们只有弄清，秃头者居住的地方究竟在什么地方，传说中的“独眼族”和“看守黄金的鹰头狮身兽”是神话民族，还是确有其人，我们才能弄清“草原之路”东端的走向。

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谈到“秃头者”的风俗。“秃头者”居住在高山脚下，吃着一种叫做“阿斯奇”的特别的食物，这是一种用稠李果的过滤的汁液加上牛奶而制成的果糕。苏联历史学家发现，今天住在乌拉尔山麓的巴什基里亚人还是剃头和以同样的食物为食，他们称这种食物为“阿克奇”。可以想见，巴什基里亚人的祖先无疑就是希罗多德所说的“秃头者”，而“秃头者”居住的高山，显然就是乌拉尔山。^④

考古揭示了“看守黄金的鹰头狮身兽”的本来面目。1930年，在阿尔泰山巴泽雷克地区挖掘了一批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墓。挖掘结果，发现殉葬品中有一些金属雕刻，内容为鹰头狮身兽，狮身有翼人头兽以及既象鹰又象狮的半鹰半狮兽。苏联考古学家认为，这些雕刻的动物可能是古代阿尔泰山地区游牧部落的图腾标记。阿尔泰山地区自古以来盛产黄金。因此，他们认为希罗多德所说的“看守黄金的鹰头狮身兽”就是阿尔泰山地区这些以“狮”和“鹰”为图腾的部落。^⑤我认为其说甚是。

希罗多德所说的“独眼族”，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古籍上查到它的行踪。我国古代的地理书《山海经》^⑥提到，在中国的北方海外有一个名叫“一目国”的国家，其人“一目中其面而居”。^⑦《山海经·大荒北经》云：“有一人一目，当面对生。一日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山海经·海内北经》云：“鬼国……为物人面而一目。”鬼、威音近，当是海外北经中的“一目国”。“鬼国”是“鬼方”的别称，即汉时称为匈奴的北方游牧部落。所以，“一目国”当是匈奴的一支部落。“一目国”人居住的地方，在钟山以东。^⑧据考证，钟山指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⑨因此，可以认为“一目国”的活动范围大致在西部地区于天山和阿尔泰山之间。我认为希罗多德所说的东方的“独眼族”同《山海经》里的“一目国”之间应该有一定的联系，很可能就是同一游牧民族，否则很难解释差不多同时问世的东西方的著作为什么会同一地区出现相似的记载。

据此，希罗多德所说的伊赛多涅斯人似应为居住在从乌拉尔山到阿尔泰山之间的中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从上面的论述可见，历史上的“草原之路”其走向是从天山北麓经阿尔泰山，穿过中亚草原，越过乌拉尔山，通过南俄罗斯草原，沿黑海北岸到达西亚和希腊地区的。我们说是“大致走向”是因为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存在一条名符其实的“道路”。

“草原之路”沿途的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这条通道的存在。

1982年，我国新疆文物工作队对位于古代草原民族活动的重要地区巴里坤县的一距今三千年的古墓群进行了清理挖掘，发现了丝织品残片。这一古墓群位于天山北麓古丝绸之路北道附近。证明三千年以前西域就同内地进行了经济交流，这比我国古史的记载要早约一千年。巴里坤地区离阿尔泰山不远。我国的丝绸完全有可能通过西域到达阿尔泰山地区。

苏联对阿尔泰山巴泽雷克地区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墓群的挖掘，也发现了一些丝织品，其中有以彩色丝线绣出杂处于花枝间的凤凰图案的刺绣，有以红绿两色纬线织出纬线斜纹显花的织锦以及战国时代的铜镜等文物。^⑩这证实我国同阿尔泰山地区游牧民族即希罗多德所说的“看守黄金的鹰头狮身兽”的经济来往至少在公元前五世纪即已开始。这也证明前面所说的我国丝绸通过西域到达阿尔泰山地区的说法是靠得住的。在巴泽雷克古墓中还发现了西亚生产的织物——羊毛线毯和非常细密的羊毛织品。显然，阿尔泰山地区的游牧民族同西亚地区是有着贸易往来的。可以说，当时的阿尔泰山地区是东西方交通的要道，是中国和古希腊及西亚地区商品的交会地区。阿尔泰山地区出产的黄金，理应是促进东西方贸易的重要因素。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发掘特洛伊古城——伊利昂城遗址时发现过一些玉石作成的斧头。^⑪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这种玉石并没有在亚洲西部发现过，只有我国新疆于阗一带才有。这暗示了公元前一千多年的伊利昂城同中亚一带已经有了间接的贸易往来。而如果古代西亚地区同天山之间不存在贸易通道的话，我们很难解释西域的玉是怎样到达西亚地区的。

由于黑海以东地区是希腊的重要贸易地区，因此，古希腊对黑海地区十分重视。从公元前七世纪起，希腊人在黑海沿岸建立了定居殖民地。例如，在克里米亚南岸有费奥多西亚和潘梯卡拨亚（今刻赤），亚速失海沿岸顿河口有塔内伊斯科，高加索沿岸也有希腊殖民地。黑海沿岸的希腊殖民地的建立是出于希腊为了控制对东方贸易的需要，而这些殖民地的建立又对活跃希腊同东方和东欧各民族的商业活动起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可见，早在张骞通西域以前，中国同西方之间最早的贸易通道——“草原之路”即已存在，而且其大致走向我们也是可以确定的。所以，我认为“丝绸之路”是我国同西方贸易的最早通道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草原之路”早于“丝绸之路”形成的原因

“草原之路”在“丝绸之路”开辟之前就成为中国同西方贸易往来的主要通道，我认为主要有以下的原因：

第一，是由于“丝绸之路”要通过广阔的沙漠，翻越雄峻的帕米尔高原，路途艰险。我国晋代高僧法显在《佛国记》中记述其沿“丝绸之路”西去“佛国”的艰辛。法显经白龙堆沙漠时，“上天无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渡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他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艰难地行走了一个多月，“路中无居民，涉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历尽艰辛方越过了大沙漠。秦汉以后“丝绸之路”尚且如此难行，在上古交通极不发达的情况下，更难通行。而北方草原，却大多为平原地区，有草有水，是天然的通商道路，因而在当时条件下，中国商品欲往西方去，只能利用北方草原这条通道。

第二，是由于在当时条件下，只有游牧民族才比较适宜担任长途经商的任务。因为长途贩运多量沉重的货物，没有大量驼、马、牛、驴子担任运输是不可想象的，而游牧民族拥有

大量可驮运货物的牲口，又过着逐水草迁徙的非定居生活，因而在交通运输落后，贸易不发达的条件下，最适宜担任长途经商的任务。而北方草原又为游牧民族的游牧生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同时，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年，中亚草原的畜牧民族形成游牧民族，这就为“草原之路”的形成提供了基本条件。

第三，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当时中国同北方游牧民族的长期战争促进了“草原之路”的形成。我国殷末西周同北方游牧民族发生了长期战争。中国古籍对此有许多记载如。《周易》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的记载。殷高宗同鬼方的这场战争长达三年才最终取得胜利，可见战争的残酷和激烈，双方动员的力量也一定是很可观的。《竹书记年》有“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等十条余记载。“小孟鼎”铭文有公元前十一世纪时，周康王、懿王、成王和鬼戎发生斗争的记载。《诗经》里也有不少反映征夫远上北方征戎或戍边的诗篇。当时的战争长期而又激烈，北方游牧民族战败后，就只有往西或往北迁移。晋代出土古籍《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征，追逐西戎，经过今新疆各地，翻越了“春山”（今帕米尔高原），直至“旷原”（即今吉尔吉斯大草原）才归。^⑩不难想象，在这场战争中，“西戎”也必定被迫从河西走廊迁至“旷原”地带。同时，北方少数民族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争。如秦汉以前，我国一些古老民族如塞种、月氏、乌孙都曾居住于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以后由于互相侵争，才被迫陆续向西迁徙到了新疆及其以西地区。我认为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就是公元前1200~700年出现大批中国北部游牧民族大规模向南西伯利亚迁徙的重要原因。游牧民族的迁徙，把古代中国的文化、艺术和商品传到了西亚和希腊等地。这些游牧民族与西亚和希腊古代民族的交往又反过来把西亚等地的文化、艺术和商品传到了东方。

可见，“草原之路”的形成同游牧民族的形成是分不开的，而中国同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又是促进中国商品向西方传播的重要因素。游牧民族是当时东西方商业贸易的中介者。一直到秦汉之际，由于中国北方强敌匈奴日益强盛，使“草原之路”受到阻塞，通过“草原之路”的东西方贸易无法进行，这样，“丝绸之路”才取而代之，成为中外交通史上的重要通道。我们也可以说，“草原之路”是早期的“丝绸之路”，后期的“丝绸之路”是“草原之路”的延续。“草原之路”作为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史上的重要一页，应该在历史上占有其应有的地位。

注 释：

①原随园：《印度文化与希腊及西南亚细亚文化之交流》第13页。转引自姚宝猷：《中国丝绸史》第17页。

②转引自杨建新、卢苇编的《丝绸之路》第4页。

③《奥德修纪》过去译为《奥德赛》，本文根据杨宪益的译作译为《奥德修纪》，文中译文也引自杨译《奥德修纪》。

④参见苏联卢里叶：《希罗多德论》。

⑤参见《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载C.N.鲁金科著，潘孟陶译：《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

⑥关于《山海经》是我国古代地理书的看法，我在拙作《中国对外贸易起源之浅见》一文中曾提及。参见上海外贸学院学报《外贸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2期。

⑦《山海经·海外北经》：“一目国在其东，一目中其面而居。”“其东”之“其”指钟山。

⑧同上

⑨参见岑仲勉：《“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丁谦：《穆天子传地理考证》。（《浙江图书馆丛书》第2期，又载1915年《地学杂志》）。

⑩同⑤

⑪伊利昂城旧译伊利亚特城，即希腊神话中希腊人长期围攻最后用木马计攻陷的特洛伊城市。

⑫同⑨